

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论文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1649

2

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論文选譯

· 內 部 發 行 ·

生活·讀者·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 出 版 說 明

本書收集的是修正主義創始人，德國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伯恩施坦的五篇重要講演和論文。在這些文章中，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伯恩施坦關於社會主義及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等的修正主義觀點。譯文是按講演和論文發表時間先後排列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

1959年12月出版

統一書號3002·57 定價（六）0.17元

# 目 录

- 一 社会主义經濟的萌芽..... 1  
    (譯自“經濟生活的各种形式”, 1903—1904年在柏林的講演)
-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 ..... 6  
    (譯自“什么是社会主义”, 1918年在柏林的講演)
- 三 走向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 11  
    (譯自“社会民主主义要些什么”)
- 四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維主义变种..... 13  
    (譯自“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 1921年在柏林的講演)
- 共产党宣言和无产階級專政的形式——布尔什維主义的产生——  
布尔什維主义的先驅者, 社会主义革命的空想家——馬克思主义  
中的改良因素——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于經濟的成熟  
——布尔什維克想用暴力迫使經濟成熟——布尔什維克迷信暴力  
的創造力——托洛茨基坐在民族的背上練習騎馬——馬克思主义  
提示意志的界限, 布尔什維克則对这种界限不予重視——拙劣  
的試驗——对沙皇專制主义的模仿——布尔什維主义的血債。
- 五 社会主义今后将会如何實現..... 31  
    (譯自“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
- 馬克思所認識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馬克思时代的无产階級和  
世界大战前夕的工人階級——用法律和组织达到改善的目的——  
企业家的組織——战争中的国民經济——所謂战时社会主义——  
德国的革命和德国国民經济的困境——在生存斗争中的新共和国  
——布尔什維主义引誘者的突击麻痺了共和国的創造力——选举  
的結果迫使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階級政党联合——虽然这样, 社会  
主义的实现还是可能的——財政困难迫使社会化通过各种不同的  
道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化——不是大的飞跃而是許多  
有重要意义的过渡——对願望的节制可以保証得到所希望的。

## 一 社会主义經濟的萌芽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經濟呢？它是什么样子？它要用一个什么名字？我們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我們龐大的、由經濟上彼此相当不相关联的地区組成的国家組織，正在逐步地越来越变成各个部分不是彼此隔絕、而是由无数的網道紧密联络起来的机体。在这个机体之中，我們看到卡特尔和辛迪加是使整个工人大軍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体經濟的联合，是对机体的生存行使巨大的权力的警察。为誰的利益行使这个权力呢？不是为創造性地从事生产的那些人，甚至不是为领导生产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只能得到或大或小的管理奖金。利潤乃是为手里握有某些股票，一种或几种股份的人而設的。是的，你們相信人类对这样的事会永远忍耐下去么？你們相信这种情况是与一个对它本身和它的行动有觉悟的人类相配称的嗎？这种情况使得很大一部分人从年青的时候起就因阶级地位关系除了借他人的劳动获取收益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你們回想一下古羅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統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結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須逐漸地交出它的統治。

这件事应该怎样产生呢，这是很容易描述的。我們看到，资本主义的企业是怎样联合为辛迪加和卡特尔的，怎样合并为托拉斯的。对于一定的生产部門，整个生产日益集中在一个大的资本主义的組合手中。凡是条件已經成熟的地方，只

要一个步骤,就是将这种资本主义的组合征用,这样一来联合起来的生产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不是再为股东进行,而是为整体,为社会继续进行。为社会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一方面,这个经济形式本身向着公有化前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成长,城市的任务也增加了。过去,当城市差不多只是由农庄和若干手工业者的街道构成的时候,那时城市领导的任务是很少的。对清洁的要求还不高,土地价值很小,当时对城市来说几乎说不上有什么管理任务。而今天,这种情形则有了根本的改变。各种不同方面的管理任务不断增加。在现代化的城市里,随着城市的发展也出现了土地高利贷和土地投机,因为城市的发展就是土地价值的增加。什么是土地价值呢?只有城市居民必须向城市土地所有者缴纳的那个资本化了的利息和税。这种利息和税成了一种与中古时代曾统治着的那些封建权利相同的封建权利。从前人民为封建主服过劳役,现在城市居民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贡税,一般的觉悟是愈来愈反对这个。把这件事委之于经济力量自由活动是不行的,因为经验表明,在经济力量自由活动的情况下,租金就会经常地上升,居住就会越来越贵,土地就会越来越多地为土地所有者生利。市政机关终于必须阻止这种活动,而要能彻底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土地完全转为总体所有。

但是就连这个也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交通政策,还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住宅政策,后者须注意到建造充分数量和合乎质量的住宅并且提供建筑和维持费用。因为人们对住宅事业的文化生活和卫生设施的要求提高了并且还远未得到满足。这种情形和类似的情形使得有必要推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市政政策并且如果这个政策要认真和有效地贯彻,那末它就不可也不会出现在那些地方,即像在我们



普魯士一樣，土地所有者根據法律在市的代議機關里成為多數，而是出現在多數市民根據民主權利在市政管理上也起決定作用的那些地方。只有在這種地方，為執行一種符合目前要求的市政政策所必需的毅力才能得到發展。

城市地方承擔的任務愈多，它本身直接或間接使用的工人也愈多，這就有必要制定一個適當的市政工人政策，這將進一步推動城市地方民主化並且進一步推動去把作為總體的經營者的城市地方為總體的利益而組織起來。這就是市政的社會主義。這樣，在我們的城市地方，在這種情況和力求上升的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不斷加强的壓力下，新的社會主義的萌芽就繼續不斷地發展。

但是今天國家的任務也比過去完全不同而且更多了。它須將交通一部分不斷加強監督和調整，一部分將經營管理交通工具的事情拿到自己手里。私人產業或私人權利阻礙分枝極多極廣的經濟生活從而給經濟生活帶來損害，因此國家必須為了社會的利益對這種阻礙加以干涉，變私人企業為公共企業，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了。總之，在這裡社會主義的新萌芽也在發展，它們最後將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一種不是鄉村地方沒有內部聯繫，不是國內或國際的資本家組合控制了生產的經濟形式，而是一種國家和城市地方用組織上的聯繫和分工，親自或通過由它們設置和監督的公共機構從總體利益的观点出發逐漸地去處理經濟任務的經濟形式。

當行會被破壞，當舊的家庭經濟公社解體的時候，人們相信，這些小範圍經營的經濟形式的破壞將會使產品以最便宜的價格和最好的形式到達公眾手里。但是自由競爭把對它的期望只實現了一半。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擠入了越來越多的作為中間商人的階層。中間商的障地越來越大，願意從事

中間商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产品对于消費者就貴了。公众也漸漸地对此有所反抗并且寻找产品供应的新形式。受产品昂貴影响最厉害的工人階級首先發动了。工人們在他們的工人消費协会里創立了排除中間商的組織，这些組織的規模在我們这里目前还很小，但是英国的例子表明，只要这些組織能够把若干消費用品的生产拿到自己手里来，它們就能發展成很大的規模。它們成为城市地方本身以消費用品供应地方居民的基本形式。倘使我們的城市地方有一天想自己来組織消費，那末它只須要在已有工人消費协会并且力量很强的地方把这些协会接收过来并扩充其业务。那差不多只是規模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質上的改变。形式在工人消費协会里就已經形成了。我們因此又有一个新的經濟制度的萌芽。所以，由于我們現代化生活所引起，一方面漸漸产生了需要和推动力，另一方面漸漸产生了一个新的經濟制度的形式和組織，这种新的經濟制度在一切方面都把大众的巨大的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之上，因此我們称这种經濟制度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至于它最后將組成何种样的形式，我們不知道，并且今天也不須知道。我們只要看見这个萌芽，看見这个經濟怎样成長为这种制度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推动它，这就够了。

我們曾經看到，人类經濟是怎样从原始的最簡單的形式逐步發展起来的，而这种發展有时又是怎样中断的。我們看到旧文化因不能繼續發展自己以致灭亡，因为統治者精神方面比体力方面还要柔弱，被統治者因奴化而萎縮。現在我們看見了一个新的經濟形式正在开始形成。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奴隶經濟了，而是以一个在数目上异常龐大、精神上百折不撓的工人階級作为經濟的基础。对于已經覺悟到要求自決的工人



們，他們作為生產者雖然仍是从屬的，但是作為公民則是獨立的，並且由於階級地位的推動，越來越多地要求公民權利，凡是對他們還扣留不與的權利他們也一定會爭到手。保證他們能夠做到這點的是：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地擴大，他們的社會意義日見增長，而最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的中心，在巨大的經濟往來的要點上他們是最為強大的。從所有這些事實看來，我們不但確信，人類不會停留在目前的經濟階段上（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人類這一次也不會向後走，而是要過渡到經濟和文化的新的，同時又是較高的形式。事情的發展所以將會這樣，也是因為現代工人階級精神上的發展所造成，是根據這樣的事實：工人階級在任何方面都在完善起來，不但它的數量在增長，不但它的經濟意義在提高，而且它的精神意義也在擴大，它正非常努力地來增加它的知識和理解。這些演講是從這種感覺出發組織起來的，如果這些演講能夠對工人階級精神方面的提高（有許多力量在對這種提高發生作用）有所幫助的話，那末它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經濟生活的各種形式”。1903—1904年在柏林給工人所作的講演。）

##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

敬爱的各位听众，目前要求社会化的呼声喊得很响亮。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化就是代替公有化的一个名词。人们不断要求社会化，“为什么现在不立刻实行社会化”这一急迫的问题也表现了这种要求，但是，在要求社会化的这一呼声中包含着一些对公有化的直接作用力的不可思议的信仰和对巨大困难，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遇到的困难的轻视，这些困难在目前的情况下正是前进的障碍。这种迫不及待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这种情绪，但是，亲爱的上帝，一件这样大的事情，毕竟不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来完成。（热烈地高呼很对！）今天我们的工业陷于停顿，它正在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并且还面临着许多我们根本无法估量的困难，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外国将要把那些条件加到我们德国身上，这时，如果设想，只要我们宣布工业公有化，即社会化任何事情就会得到有利于工人或集体的改善，这就是——恕我用一个粗暴的名词——相信不可思议的奇迹。（鼓掌）

国有化或地方公有化是公有化的典型。它们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最大可能使大家幸福才是目的。它在经济、生产、贸易和交通各方面将通过极端经济措施而得到保证。如果社会化了，人们就要不断质问：我们就这样前进以使我们的经济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呢还是我们暂时因为形

勢的壓迫不能前進而向後退呢？這種急躁情緒是我所理解的，我把它當作推動力，但是我們不能向自己隱瞞，今天為的是什麼，下的是什麼賭注。公有化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把生產和經濟生活置於群眾監督之下，置於一個遠遠比過去更為有力的監督之下。公有化，使經濟歸社會領導，並使它為社會服務，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道路，而不是僅有一條固定的道路來實現公有化。可是目前在我們德國的經濟生活中（農業除外），有整整300萬個種類不同的企業，其中半數以上是小型企業，個別企業或者不值一提的可能只有一個伙計的企業。這樣的企業我們算它是2/3，那末還剩下100萬個各式各樣的中型和大型以及最大型生產企業。你們相信，如果在這些企業中到處都放上一些國家公務人員來代替企業家，這些企業會得到改善嗎？我不相信。這是一個實際上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徹底地、系統地來完成的進程。人們應該研究，哪一種宜於首先很好地、儘快而最有效地為社會所接受，哪一種宜於並且應該留在私人手裡，以便使人民賴以生活的經濟繼續下去，使它不致陷於停頓。我們的人民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指靠工作來維持生活。

敬愛的各位聽眾，因為在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大體上來說還是一個富足的國家，在戰後的今天它變成了一個貧窮的國家，所以它必須採取貧窮國家所執行的經濟政策，並且因為這個國家為了能夠進行經營，而不得不輸入價值數十億的原料和部分食品，所以它必須輸出產品。因為產品終歸只能以產品來償付。黃金很快就要枯竭，而我們所印的紙條條在國外沒有人接受。（熱烈喝采）

第二任首相卡普利維伯爵當時（90年代初）在指出德國不能生產它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和不能自己生產全部糧食時曾說

过这样的话：我們必須輸出貨物或者輸出人。而輸出人換句話說就是移民。我耽心，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人要被迫移民。（呼聲：往哪里去？）但是，我們不願意人為地將移民的人數擴大。已經有人向我提出問題：往哪里去。今天我們在世界上所受到的待遇和在那個可怕的、萬惡的戰爭以前完全不同。我們遭受到憎恨，這種憎恨在敵對的立法中明顯地表現出來。這就使得移民比戰前困難得多。這樣我們的工人的處境只能夠像弗萊利格拉所說的：“她尋找別人的爐灶，靜靜地坐在灰里。”因此，我們今天不能再人為地將移民的人數擴大。我們應該設法使必須到外國去的工人數目保持最低限度。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慎重地、系統化地進行社會化以及為什麼我們要讓還沒有社會化的工業在這個期間存在和工作下去的一個原因。（熱烈喝采）我再重復一遍：社會化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道路。它可以通過將一定的工業直接接收的辦法，使它們成為邦營企業也好，地方公營企業也好，國營企業也好。但是，社會化也可以這樣進行，即借助各種法律和規定使群眾越來越多地參與監督經濟生活。今天已經這樣做了。就是工廠法當年也被資本家看作是侵犯他們尊嚴的東西。他們想作他們家裡的主人。在我們這裡，俾斯麥也曾經發表過和英國最早一批廠主相類似的意見。他也希望這個法律不要進到工廠里去。但是它仍舊進到工廠里去了，它為了群眾的利益和幸福，為了社會進步的福利進到工廠里去了。它還可以繼續不斷地一步步地擴展。各邦、國家和群眾都可以逐漸參加到暫時還保留在資本家手中的企業里去；參加到這些企業的收益和定價方面，以杜絕一定會造成物價高漲的壟斷。（很好）。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它還將繼續發展下去。用這種方法，邦和群眾就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利並能夠越來越多



地参与生产。

2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說过这样一句話，今天我还要重复一遍：一个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鼓掌) 因为在这里抓住了更多的群众。至于国家多有或至少有几个企业（而且也許还按资本主义方式去經營这些企业）算得了什么？

工人阶级要求国家民主化、企业民主化和所有的行政管理民主化，并要求将民主化扩大到一切部門，扩大到教育事业、体育、艺术和交通等方面。工人运动由于它的全部本質和下列事实而向各个方面推进，即在运动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在精神上也先进的分子，他們不满足于得到物質方面的利益，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希望在精神方面也要得到实际自由。这种人可能还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多，但是，参加学习的、受过教育的数目和有崇高精神的工人数目正在不断增加。今天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工人表现了他們有能力从自己的阶级中出来担任国家或各邦的重要职位。我是最不会奉承工人的。在工人大会里我也对他們表示我的意見，而且比在这里更能够暢所欲言。但是我要說：工人运动創造了一个偉大的事业，因为它把什么是阶级覺悟向工人解释清楚并使他們牢牢記住，这种阶级覺悟是許多资产阶级和你們当中的許多人所咒罵的和討厭的，但是这些人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因为具有真正阶级覺悟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这一偉大革命能够在我們目睹的一切动蕩中相当平靜地，我想說合法地进行，这应当归功于我們有这样的工人阶级。

两星期以前在柏林这里举行了一次經濟會議，在会上我对资本家說：你們常常咒罵工人运动或者为它而生气，可是如果你們現在看到革命，你們就要說：什么是柏林那个可怜的

事件啊？什么是示威啊？原来它几乎没有触动任何人一根頭髮。固然在这里或那里也發生过越軌行动，但是整个說来，这个运动是平靜地、合法地进行的。原因何在？因为我們在革命以前有过一次工人运动，它把工人組織起来了，它在一切可能的学校里对工人进行政治上的和工会方面的訓練，使他們能够明了和掌握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而不是像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懂的工人們所能做出的那样盲目乱打一陣。

（譯自伯恩施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1918年12月28日在柏林“音乐堂”大厅  
所作的講演。）



### 三 走向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

但是这种社会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只有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再在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的领导下为互相竞争的资本家的利润服务，而是在总体的代理人的领导下有计划地为总体的利益服务时才能成为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这种社会制度才能产生。而走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就是使生产公有化，不过换一个名词罢了，就是总体通过它的机构——国，邦，地方——逐步地将生产资料收归己有，将生产置于它的领导之下。

这当然是一件巨大的任务，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工作。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仅在工业方面（即使将在51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不算在内，虽然这些中小企业的总人数也在300万以上），就超过20万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单位的工人加在一起就超过500万。它们在规模和种类、产品性质以及关于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常常极为不同，它们是经济力的极其多种多样的游戏，要把它们一下子宣布变为国家财产，那将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官僚主义，那时，半数生产（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都将停顿起来。像通过两个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想到这样无意义的举动。

社会民主党知道，人们在某种条件下能够在短时间里推

翻一个政府，但是不能同时将数百年来在發展中成長起来的經濟制度在它的所有的部門中改革掉。社会民主党知道，不是所有的生产部門都成熟和适于用同样的方式改变成社会的企业。因此它决定在那些已給国家創造了最好的条件，使它可以成功地經營的地方开始全面地实行社会化并从那里起有系統地工作下去。它因此也不是那样糊涂，来規定办法或頒布法令，为社会化尚未抓住的商务活动带来危險并給私人經營者繼續經營他們的业务的热情潑上冷水。在为自由經濟保留的广大区域里，經營者（無論是厂主或商人）应该和过去一样安全地从事他的业务并保有按照需要發展他的企业的可能性。

有人說社会民主党只承認体力劳动，也許还承認技术員和會計員的工作，說它不尊重企业領導的重要性，或者不了解每一个企业随时要增加或扩充它的营业資本这一事实，这种見解是完全錯誤的。社会民主党对私人企业主的必要性完全理解并且当这些必要性須要与工人的要求——足敷生活的工資和保护他們不从事过度劳动，不受專橫之苦——協調的时候，根据可能考虑这些必要性。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主义要些什么。”）

## 四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維主义变种

共产党宣言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形式。——布尔什維主义的产生。——布尔什維主义的先驅者，社会主义革命的空想家。——馬克思主义中的改良因素。——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于經濟的成熟。——布尔什維克想用暴力迫使經濟成熟。——布尔什維克迷信暴力的創造力量。——托洛茨基坐在民族的背上練習騎馬。——馬克思主义提示意志的界限，布尔什維克則对这种界限不予重視。——拙劣的試驗。——对沙皇專制主义的模仿。——布尔什維主义的血債。

什么是我們所知道的布尔什維主义那个理論的基本思想呢？它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卡尔·馬克思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中在論及工业資本家的产生的第25章<sup>①</sup>第6节中，描写了所謂資本“原始积累”即資本原始的构成的各种方法。与資产階級經濟学家所謂資本的构成是由于“儲蓄”或節約的說法相反，馬克思指出，資本完全是通过別的方法形成的，关于資本的这种真正原始的积累方法他写道：

“在十七世紀末的英国，它們被系統地概括在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护關稅制度中。这些方

<sup>①</sup> 应为“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第6节。——譯者注

法一部分是依靠極端殘忍的暴力的，例如殖民制度。但它們全都利用国家权力，利用集中而有組織的社会力量，溫室式地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轉化过程，并縮短其过渡時間。暴力是每個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經濟的力量。”

这一段引文中的最后兩句話，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其理論知識直接来自馬克思的各个政党中，曾經起了特殊的作用。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是他們的一位領袖，同馬克思要好的儒勒盖德是他們的另一位領袖），用教条主义的解釋来宣傳这两句話，借以証明一切社会主义的活动都必須用革命暴力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应当指出：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簡單地說明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并没有提出直接运用的公式(注)。

然而，自称为布尔什維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一派，从对一个历史事实的这种確認中作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必須遵守的一条准則：为了建立新社会，我們必須使用暴力，別的路是行不通的，我們的整个思想和願望都必須針对着夺取政权这件事。这是一种当然能以“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地方为依据的見解。例如在那里，末尾談到无产階級夺得政权的地方說：“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階級变成成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

(注) 拉法格对馬克思的說法所作的这种解釋，馬克思究竟怎样不同意，可以从他在1882年11月11日給弗·恩格斯的信中看到。在那里，馬克思給他的朋友写道，拉法格实际上是俄国人巴枯宁的学生，并憤怒地宣稱：“朗格是最后的蒲魯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則是最后的巴枯宁主义者！*Que le diable les emporte!*”

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然后列举了一系列与以往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某些措施相符合的措施。此外，上述思想方式的拥护者援引了卡尔·马克思论及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的一封信中的某个地方。在那里，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除了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这个句子也被布尔什维克（人们这样把这个字用到德文中来）教条主义地解释了。这个今天作为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来领导第三国际（或共产主义国际）的党，从前也自称为多数党。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互相争论中，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要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的纲领（“最低限度纲领”）来进行斗争，就像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制定的一个有马克思为他们所作的序言的纲领，另一派则主张必须最高限度地提出要求，并把它作为照耀运动的一个灯塔经常高举着。在这两派中，后者正是布尔什维克派，而前一派则被称为孟什维克派或孟什维克党——这个称呼是或多或少适合这个词的概念的，一方面是指所提要求的高低而言，另



一方面則指拥护者的多少而言。这个爭論大部分成了对馬克思的言論所作的經院式的玩意，其中一方不顧这样的事实，即馬克思的全部学說主要的是發展学說，而馬克思本人在若干年中也經歷了一个發展时期。恩格斯曾一再承認，在他們活动的初期，对于發展的速度和进程，他和馬克思曾犯了許多重要的錯誤。是否馬克思学說本身因此就完了呢？当然不是。馬克思主义之所以偉大、持久、超出一切个别应用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馬克思主义在社会發展学說的主要思想上，在生产方式有一定影响的理論上，給了社会的發展学說一个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馬克思曾将他学說中有系統的發展思想再度非常肯定地表达出来。在他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的序言中就是这样，在1866年“資本論”的序言中也是这样。馬克思在1866年“資本論”的序言中說——这对于他的世界观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甚至現代的統治階級也漸漸地懂得，現会的社会“不是坚固的水晶石”，而是“一个可以轉化的并且是經常在轉化中的机构。”

这里表明了基本观念的不同，它把我們今天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維克党和它的西欧的模仿者区别开来。

布尔什維克党是从俄国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学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恰巧可以称为这个学派本来的創立者的三个人物——已故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諾夫、刚去世的維拉·查苏利奇和尚在世上的巴維尔·阿克雪里罗得——是布尔什維克的敌人，或者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反对布尔什維克的人。我在上面曾說过，布尔什維克是極其經院式地援引馬克思的話的，我这里还要加上一点，就是我把那种精神傾向或精神活动看作經院哲学，它們常常为已經确定的科学定理用强制的說明艺术推断地提出証据，而归納的因素，对



事实的审查，如果不是完全置諸不論，就是非常失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發展學說的主要特点，恰好是这个學說着重強調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事實即與生產關係的緊密的、有機的（人們在這裡可以極有理由的說）聯繫。從這個觀點出發，“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他們對他們那個時代來說是這樣革命地思考，這樣毫無顧忌地贊同那時工人運動中進步的一翼的共產主義思想），當他們制定他們的理論時，就已經表示反對當時的急進社會主義者，這些急進社會主義者被認為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而事實上他們只要求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空想主義者的稱號。德國共產主義者威廉·魏特林就屬於這一類人，他確實有才能，但他缺乏科學知識，他是1842年出版的“和諧與自由的保障”一書的作者，馬克思很重視這本書，但這並沒有妨礙馬克思後來嚴厲地反對他，因為他誇大地鼓吹急進主義，弄得工人們暈頭轉向。這點之所以值得提出，是因為魏特林的思想與目前布爾什維克的信徒用以向工人們說教的許多口號有類似之處。

1846年年底至1847年年初的冬天，魏特林來到布魯塞爾，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住在那裡，從事他們偉大理論的創造並且進行筆戰。當魏特林有一次訪問馬克思的時候，俄國作家安年柯夫也在座，這位作家在他的回憶錄中描寫馬克思和魏特林的劇烈衝突。出自工人階級的魏特林，向馬克思主要地（像根本地）為他的理論的感覺方面辯解，值得注意的是，據安年柯夫說，馬克思是何等強硬地對魏特林強調具體而科學的思想的必要性，他曾用拳頭擊着桌子憤怒地叫道：“不學無術，還從不曾對人有过好處！”

過了四年，在革命以後，馬克思和他的早年戰友發生了衝突，他們用和魏特林相似的方法主張感覺和意志。這是卡

尔·沙佩尔和奥·維利希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派。这种矛盾重演于1870至1872年間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斗争中，对巴枯宁和更甚地是对——我不能說是“学生”，甚至說不上是“同志”，虽然他对巴枯宁發生过重大的影响，而是——巴枯宁暂时的共同奋斗者，那个大学生涅恰也夫，一个应该称之为布尔什維主义的先驅者。他的思想是在主要地由恩格斯并得到馬克思贊同所写的“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一文予以說明和批判的。这篇文章特别是异常尖銳地反对巴枯宁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涅恰也夫則把这种浪漫主义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成了一种Rinaldo Rinaldini<sup>①</sup>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巴枯宁特別贊美了俄国的强盜并且贊美到这种程度，以致宣布說，如果要革命，就必须将牢門打开。这是对那些不顧理論和道德等等而簡直与有秩序的社会相对立的坏分子的一种空想。駁斥这些幻想以及強調向社会主义發展与一般經濟的發展的联系即最后与生产方式的联系，是馬克思学說中的主导思想。因此已从“資本論”序言中所引的那个句子，——即現在的社会，自由主义經濟的社会，“不是坚固的水晶石，而是一个可以轉化的，經常处于轉化过程中的机构”——比某些其他常引証的句子要重要得多。在“資本論”的另一个地方，在談到工厂立法和描述十小时工作日对于郎卡郡棉紡工人的作用时馬克思說：

“然而这个原則(指以法律限制工作時間——伯恩施坦)随着它在大工业部門中的胜利而胜利了，大工业部門是现代生产方式特有的产物。1853到1860年，与工厂工人生理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再生結合在一起的大工业部門

① 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沃尔皮烏斯的一本有名的强盜小說。——譯者注

的驚人發展是昭然若揭的。”

与上面所引証的句子相联系，在“資本論”的序言里馬克思說：

“在英国变革的过程（社会的轉化过程）已經是十分明显的了。这个过程發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一定会發展到大陆上去。它在那里将是采取較为殘忍或較为仁柔的形态，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不管有沒有較高超的动机，現今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就会使它們除去一切阻碍工人階級發展而可以由法律控制的障碍。所以，我也在这一卷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細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結果。一个民族應該而且可以向別的民族學習。”

我敢說，按着思想过程來說，这点也表明馬克思革命理論中的一个劇烈的改良混合物。馬克思在精神的發展方面越是前进，那末在他那里經濟發展程度与政治和法律干涉的可能性之間联系的思想也格外表示得清楚。1875年，他在論当时統一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綱領草案的一封信中說：

“法律永远不会高过經濟形态以及受此限制的社会文化發展”。

在布尔什維主义那里，——我再強調一次，在它的理論里：——这一切都被置之不顧或規避了。布尔什維主义或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依据宣言中那些簡潔而尖銳的、但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言論，在那些言論中，他們对“à l'égard le bourgeois”（資產者）說点使他們吃惊的話感覺得有兴趣。布尔什維主义或是对于馬克思較晚的言論断章取义地給予一种愚蠢的和最粗糙的解釋。在說明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的“資本論”第一卷倒数第二章中，馬克思这样說：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伯恩斯坦)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末日到了。剥夺者被剥夺。”

因此如果发展本身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那时剥夺者——马克思称资本家为“剥夺者”因为在竞争中资本家剥夺小资本家——就要被剥夺了。从这一句描写历史远景的句子中，布尔什维克得出了一句格言：“打劫打劫者！”而工人们也就按照字面接收下来并且极为粗野地使用起来了。企业家简直不是被当作经济上的剥夺者而被当作道义上的窃犯、小偷来看待。这是直接与马克思相反的，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序言中，在提到书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不是很好地脱身，把他们描绘得不是很好看的时候，明确地说：

“可是，这里讲到的是一些体现着各个经济范畴的人。我的观点是在于我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按照我的观点，比之按照任何其他观点，都更少能认为个人应对他在社会意思上说始终是其产物的那些条件负责，哪怕这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出了这些条件。”

我说，无论在哪一点上，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在这些地方都把马克思的学说变得粗糙了，也可以说：变得野蛮了。作为生产推动力的企业家的历史的、到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所必要的作用，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中消失不见了——这点又与马克思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这本书当然很少人读到)最后几章中的一章——第24章——关于收入的来源中分析说，剩余劳动根本必须作为劳动者超过给与他的需要的限度的劳动永远留下来，下面接上所引证的句子：



“这是資本的一个文明方面，就是它用一种方法和在某些条件之下强迫剩余劳动，这些条件对于生产力的發展，社会关系和为一个較高的新生創造因素比在从前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形式下更为有利”。

馬克思再度指出，資本在人类社会的發展中起着重要的（虽然他平时猛烈攻击資本）、推动的、他特別說是文明的作用。

对于这一切并由此对于經濟政策产生的結果，布尔什維克都漠不关心，他們把暴力看作万能者。在布尔什維克的领导人中，人們可以看到更多——比在列宁、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其他人那里的还多——把万能的不可思議的力量都簡單地归功于暴力的句子。人們只要有了暴力，那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操縱發展；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証明这一点：

馬克思在1859年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的序言中說（这当然也是重要的）：

“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給以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們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現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可以讀到：

“固然，一个社会即令它已經發現了自己运动的自然法則——而本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現現代社会的經濟运动法則，——它也还是既不能跳过自然的發展阶段，也不能用法令来廢止这些阶段。但它能够减少和緩和生育时的痛苦。”

馬克思是这样写的。現在我們再看一下布哈林的著作：“共产党綱領”（布尔什維克）。他在这个綱領中宣称，在俄国，

这个整个来说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馬上就会实现工人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目前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工人阶级专政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扼杀资产阶级和地主”，并接着说：

“工人政权只能从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长起来。”

而这是在一个显然还根本未曾有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里写的！此外就是说，专政必须是“热心”的，这个字眼像在这篇文章里一样，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中屡见不鲜并且表示为残暴的意义。在几页以后可以读到：

“现在我们看到，对于革命的敌人侵犯其任何自由是必要的。在革命中就不能给人民和革命的敌人以自由。”

但是不仅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毫无区别地都被看作革命的敌人，而且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不同立场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被看成是革命的敌人。这是人们所能想像到的极端的恐怖主义。在托洛茨基的“苏维埃政权和国际帝国主义”一文中——这是托洛茨基对未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所作的讲演——，可以读到：

“而政治家站在中间，他们时而向左转，时而向右转。这就是孟什维克和站在右边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他们要说：‘权力应该平分。’”

他对工人们说了这些话啊！他接着说下去：

“但是，同志们，政权并不是一片面包，可以切成两块，再分成四块。”

这是什么比喻和怎样地否认历史啊！下面这几句话表明其目的何在。托洛茨基说：

“政权是某一个阶级借助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工



具。这个工具或者为工人阶级服务或者被用来反对工人阶级。”

这样一来，各民族生活中的发展被抹煞了，从一个社会状态到另外一个相反的社会状态就没有过渡，没有发展，而是只有通过政权来使其转折。话是这样说下去的：

“这里没有选择。只要存在着两个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和无产阶级一起的极端贫困的农民——，只要这两个敌人互相斗争，他们当然就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武器。不可能想像，一尊大炮同时为这一个军队又为另一个军队服务。”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个论据的性质，必须记着，这个论点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的以及它要印入工人脑子里的那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怎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政治问题对工人们用这样简单幼稚的对照来阐述过。即使当德国经济方面远超过1918年的俄国时——文化的发达更不必谈了——，他们仍表示由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暂时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是合适的。

按照上面这个推定的典范，这个适合于最天真和不开化的人民理解力的推定的典范（这些推定贯串在整个作为宣传文字而翻译成各国文字的演说中，并和关于世界大战原因及其影响的妙论相交替），托洛茨基谈到由布尔什维克行使政权并且用下列的论据提出原谅他们的错误的要求：

“有一些人说：如果你们事先没有学过怎样行使政权，那你们为什么要政权？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如果我们手中没有木工的工具，那我们怎能学会木工手艺。为要学习治理一个国家，就必须将水准尺拿到手里，就必须将国家政权拿到手里。还从没有人坐在屋子里学会骑

馬的。為了要學騎馬，一定要給馬安上馬鞍並且坐到馬背上。很可能這匹馬要用後足直立起來並且多次地把我們摔下來。我們將爬起來，安上馬鞍，再騎，這樣我們就能學會騎馬。”

如果這樣一種試驗只涉及那些想學習騎馬——指的是治理——的人，那末我們可以說：好得很。但是不知道會引起什麼結果，就施用強力用整個的國家作徹底的經濟試驗，並且這樣想，這樣雖然也許會走錯，但是不要緊，那就再來一次。就這樣地對待一個大的民族，因而可能使成千上萬的人遭受飢餓、貧困或毀滅，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對於社會改革者，革命者來說也有一個絕對命令啊！布爾什維克所依據的是偉大思想家的科學學說，凡是对他們不適用於的地方就不加理睬，對此他們毫不關心，這是布爾什維克思路中的錯誤因素的特征。

因此我確信，我並沒有想到去懷疑布爾什維克的動機。像在每次革命運動中一樣，在這裡當然也有很大數量的唯心主義者。但是其中一定也還有別樣性質的人物。然而我把這個因素暫時擺開。在這裡是談的理論，談到理解的方式和它怎樣反應到布爾什維克的行動上。而那裡恰好表現出來，他們是怎樣嚴重地與偉大的匠人和思想家卡爾·馬克思的看法不符合啊！他們承認，他們的活動幾乎完全不受社會制約。對他們來說，與若干大工業存在的同時在國家中也有一個無產階級，它強大到足以在採用暴力時發揮積極作用，這也就足夠了。但是平時在他們那些極其多種多樣的文字中，那些強調無產階級要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和經濟發展的成熟作為社會改造的條件的社會主義者，無論他們是否馬克思主義者，都被輕蔑、嘲笑或甚至辱罵。例如一個應當說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就遭到輕蔑、嘲笑或辱罵，因為他批評列寧

和他的同志們的方法，他們就立刻稱他為叛徒，至于說到鄙人，我就根本不想講了。

布尔什維主义几乎不知道在历史上有意志的界限。布尔什維克政治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做得好像对于革命維新者沒有同样的意志一样。在他們的絕大多数措施中与其說他們是馬克思主义的肖像，毋宁說是原始沙皇制度的肖像，他們只是馬克思主义的諷刺画罢了。因为馬克思理論的很重要的地方正就是他和恩格斯的学說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意志界限的有科学根据的学說。人們因此常称这种学說为宿命論的学說，但这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义远不是否認意志在历史上的意义或者沒有認識其必要性。曾經有过一个民主詩人，他已久被遺忘了，但是他的詩曾被傳誦一时和受到过一些人的贊賞，那就是死得很早的弗里德里希·馮·薩萊特，“俗人福音書”的作者。在他的“历史性的發展”一詩中，他歌唱在德國政治靜止的时代：

人們告訴我們：青年人怀着过度的热血  
把狂热的創造冲动謝絕，  
历史上只發展好的事，——

而你們說，当什么也不發生的时候就是历史！

馬克思完全承認这种观点，它完完全全地符合馬克思的理論。但是人們所做的，也只能在已有的力量和發展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貫徹。

恩格斯曾在与杜林作斗争的文章中对于这个问题用了好几章宝贵的篇幅来加以論述，这些篇幅在今天又变得很重要了。其中一章特別地也击中了布尔什維克的方法，即将極端不同的东西按它們外表的特征而加以同等看待，并且对社会机构的历史制約性未予应有的注意。杜林曾談到整个希臘文

化賴以支持的希腊奴隶制并且将它和雇佣劳动制等同看待。恩格斯对于这件事答复說：

“如果說，雇佣奴役制不过是和奴隶制一样，那末也可以說，吃人制和雇佣奴役制一样，因为原始的不是奴隶制而是将被征服者吃掉。在历史上有好多次是單純的暴力反对經濟的發展——，或者是它和經濟發展一路走，那末他就完成了它的目的，或者它背着經濟發展走，那末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强力（特别是如果野蛮民族襲击文明民族的时候）就会毁灭整个的文明，或者在时代过程中經濟因素战胜了暴力，暴力就屈服了。”

現在，布尔什維克自己也不能再否認，他們也有这个經驗：凡是他們的暴力措施沒有考慮經濟制約的地方，就要遭到可伶的失敗。但是不幸地俄国人民对于这个經驗要付出无限牺牲作为代价。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偉大的地方，正是他們知道历史上意志的界限，它有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以后它又贊成革命。在恩格斯送給我的一篇馬克思遺稿中的一頁上——这是馬克思“共产党宣言”初稿中的一段（从未付印过）——有这么一句話，是馬克思对那些旧社会代表們（这些代表們宣布这个社会在它的基础上是不会被摧毁的）說的，他說：“你們是向后倒退的空想家！”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你們要阻碍發展，否認可以有一个超过你們的社会形式的其他社会形式，你們想断言你們的社会形式是最后的；但是如果你們这样宣布了，那末你們就是向后倒退的空想家！馬克思主义極其有力地強調意志的力量。在为采取行动所必須有的客观条件还缺少的情況下，它虽然不使工人采取行动，但是它也鼓舞他們，保护他們而不使他們气馁。为馬克思主义精神所影



响的工人运动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胜利是我们的！”是它的主导旋律，是感觉：“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代表未来的事业！”无视于意志力量的界限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不幸的失算。他们宣布在所采取的政策中许多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是他们不得不一个跟着一个地承认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拙劣的试验。相当多的文献曾为此提出极多的证明。当然在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和计划中可以找到许多动人心目的事情：有关教育和社会救济的伟大计划，有关组织生产和流通的伟大计划，有关开发及利用地下蕴藏等等的伟大计划。但是这样一些东西平常在社会主义文献中也找得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社会主义空想家的文献中充满了常常是伟大的思想和意义深长的规划。异常多的精神和智慧是在那里浪费了，许多东西在纸上想得非常出色！有些东西也逐渐地实现了，即使不能像空论的作者所想的那种范围和方式。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俄国今天相当缺乏一切先决条件，而且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精神方面的必要性而自己破坏了这些计划的。所以在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就鼓励工人儼然在实际上充当工厂的主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承担经济上的责任。结果怎样呢？厂主维持不下去，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就是不能独立地领导工厂，他们不是企业家，而且也不愿意做。不仅如此。一部分工人——并且值得注意的：很大一部分正是熟练工人——同样地离开了工厂。在布尔什维克自己发表的文件中可以读到，很大一部分熟练工人直接从工厂逃往乡间，为了在那里做个小手工业者，聊以为生而已。

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四年过程中，俄国城市人口数目降低了四分之一以上，乡下的土地收益也日益下降。从形式上几已不复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实际上奴役无产阶级，并



且从“扼杀”(是为与布哈林談的)資本主义的企业家变为养成官僚主义，几乎沒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家和工业方面存在着这样多的官僚主义。

我不想对这件事作詳細的叙述。我并无意在背后說布尔什維克的坏話，我只研討布尔什維主义的缺点，因为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和方法是今天社会主义重要的爭論的問題。而我所概括地提出的事实，在布尔什維主义的文献中也已提出，这些事实在那里乃是热烈討論的对象，因为人們害怕这会产生不幸的后果。此外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布尔什維克制造了新的資本家并将外国的資本家拉到国内来。他們用尽了他們一切政治权力但就不是事情的主人。有一件事他們当然可以做到，那就是依仗着他們的近衛軍压迫箝制，为所欲为。恐怖政治并未削弱。但是亞洲的專制帝王和非洲的苏丹也都曾懂得这点。在俄国，痛苦不断在增長，对一切政治自由的压制繼續在进行。社会主义其他派别的报纸得不到發行，資本主义的报纸完全沒有，只有布尔什維主义的报刊才被容許。具有其他思想的人們也沒有集会的自由。自由的經濟創造力被扼杀了，而这种創造力对于俄国來說就是需要，如果俄国想多少恢复点元气的話。

这是旧沙皇專制政治的一段奇妙的重演。关于生在19世紀中叶并作为欧洲反动派的保护者的尼古拉一世曾經有过这样的傳說，說他当铁路發达，于是他也想有一条从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铁路时，他叫人拿来一張地圖，在圖上划了一条直綫：这条铁路就是这样造法！这条路到現在还叫尼古拉铁路。当然建筑这条铁路的花費是極其巨大的。土壤情形、沼澤等等沙皇都沒有給以理会，他要怎样做，就得怎样做。在尼·烏里揚諾夫·列宁身上也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其結果是造成

了不断加剧的經濟的混亂。

· 無論哪里，凡是沒有正常的法律關係存在的地方，凡是法律不穩定的地方，凡是人們今天不知哪些法律明天有效的地方就要發生破壞。而我們今天所听到的关于俄國的事，关于成百万的人所遭受的那種可怕的飢荒，部分地也是這種試驗的結果。誠然，直接引起飢荒的是自然災害——大旱災。對於自然災害人們迄今尚無能為力，但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甚至對付旱災，人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凡是施足了肥料並且用心地耕作過的土地，它的抗旱能力就比缺少肥料和只是粗糙地耕作過的土地要強得多。凡是一個民族，特別是耕種土地的民族（俄國主要是農業國），凡是農民沒有確實把握能保有他們的土地，能將收成給自己留下的地方，農民自然就耕作得馬虎，就不給土地施加肥料。因為這種事實，例如過去一度是被稱之為肥沃天堂的小亞細亞，正是在西面，在土耳其帕沙的專橫統治和土耳其任意徵稅的制度及實物稅之下，大部分都變成砂地了。令人遺憾的是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由於沒有正確地認識到經濟規律，沒有正確地認識到經濟生活中的物質、精神或心理上的條件以及經濟分子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職能，而出現了可怕的後果。人們竟讓那些部分地曾經營得極為合理並且曾提供大量的多餘產品的大地產被分給農民。結果怎樣呢？多餘的產品不再有了。人們不能使制度和黨對一切都負責。在革命中也會發生許多違反革命者本身的意志的事情。但是為使不可避免的障礙儘可能減至最低限度，並儘可能快地辦到與恢復經濟生活的需要相適應的狀況，於是要求一切置身於法律狀況基礎（這個基礎是1917年2月革命所奠定的）上的人來共同行動。至於人們在空想中引起相反的結果，這只能因為有了暴力，為的然後——像布哈林

所說的——，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被“扼杀”了，可以从新开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这样的混乱。只有玩积木游戏的小孩子才能够这样做。而这样一种思想，即想能这样摆布有千百万人的人民的生存条件的思想，乃是皇帝的疯狂，不管是出自一个戴皇冠的独裁者或是出自革命者。它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只能获得地盘，因为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种解释得完全错误的、极端粗糙的马克思主义。

对此还有下边的话要说：

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是很多的，显然地可以引证一些。为的不要引起别人指摘我偏颇，我就在这个地方对这件事丢开不谈。只有一个著作我相信应该记住的。那就是尼·格非莫夫“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那部小作品（柏林自由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个俄国人，他曾在俄国，这个以前的沙俄帝国，经历过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沙皇俄国革命恐怖主义者的运动的内在联系，他说这个运动并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是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且在急进主义方面一个要超过一个的这种趋向，从俄国的政治状况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这种方法来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受到应当说是粗野的解释是很可能发生的。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现象，这个可由在俄国长期统治着的关系来作解释，在那里，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之下，极端强制的压迫手段已成习惯。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非因此就有模仿的价值。它是思想上一个异常不幸的错误的毁灭作用的例子，它的表现是：相信野蛮暴力的全能，不認識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律和輕視从野蛮中跨出来的人类社会在發展中的組織原則。

（摘譯自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現在”。）

## 五 社会主义今后将会如何实现

馬克思所認識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和世界大战前夕的工人阶级。——用法律和組織达到改善的目的。——企业家的組織。——战争中的国民經济。——所謂战时社会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德国国民經济的困境。——在生存斗争中的新共和国。——布尔什維主义引誘者的突击麻痹了共和国的創造力。——选举的結果迫使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虽然这样，社会主义的实现还是可能的。——财政困难迫使社会化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化。——不是大的飞跃而是許多有重要意义的过渡。——对願望的节制可以保证得到所希望的。

有人对本文作者重述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發言。但是我想不起曾說过这样毫无意义的話。事实上当时（在1898年春天）我在对說我在文章里几乎从未提到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这一指摘作答复时曾經說，我对一般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很少鉴赏力和兴趣。这个目的（無論它是怎样的）对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承認这是个人的漠不关心，但是距离提出一个普遍可以采用的客觀原理还很远。

但是，發言被这样地理解了，并且引起了許多爭吵。这是怎样造成的，在这里可以不作說明。但是，应当指出一点，就是



如果在不同于当时存在的情况之下，是不会有对它加以责难的。因为在这里所说的与马克思1871年在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中所说的并无重大差别：

“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决定来实现完满的乌托邦。它知道，要谋得自己的解放，并从而达到现代社会由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止地趋向着的更高的生活形式，它必须经过顽强的斗争，必须经过整整一系列把人和环境都完全改变了的历史过程……它只要去解放那些已经在崩溃着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了的新社会因素就可以了。”

我用下面的话来对所引证的宣言作了一个补充：

我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社会运动，这就是说理解为社会的进步，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进步的政治和经济的宣传及组织。

要想造成一种印象，说马克思的发言和我的陈述在意思上根本没有重大区别，那是荒谬的。这种区别是不可争辩地存在着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估计适当的新社会到来的速度和旧社会崩溃的速度比我估计得要快，并且在这个推测中用了另一种说法。但是，把这个运动和由它产生的斗争看作有决定意义的，并认为一切都是由运动来决定的思想，在他那里也是主调。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提到的文章，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可以提出问题，问他是否仍旧相信，旧社会的崩溃可以不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有一些人对此表示同意，无论如何，为了正确地估价马克思的属于他生存时代的各种言论，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为了我们进行考察，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在这里厚颜地宣布，未



来的新社会只是“整整一系列把人和环境都完全改变了的历史过程”的结果。

当马克思写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时候，欧洲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处在倾向于民主的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根据自由主义的精神修改了宪法，对报刊和结社权的束缚放松了或取消了，选举国会的权利放宽了。在英国，自由贸易获得了胜利，看来它还要从那里通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胜利进军。降低了税率，缔结了带有最惠国待遇条文的贸易协定，这种协定是走向完全自由贸易的初步。所期待的世界和平时期自然是被德国的三个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但是它们所引起的经济生活的损失并不太明显。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时期而仍旧向上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国际贸易关系频繁了，城市和工业中心扩展了，工商业企业扩大了，因而产业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在七十年代末当马克思因病而不得不搁笔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时期就停止了。保护关税的反动浪潮流过全世界，并且招致了帝国主义性质的殖民政策运动；大国间的关系恶化了，它们开始组织联合，接着进入海陆军军备竞赛的时期。但是，同时工人运动也有了新的高涨，社会主义的国际复活了，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参加国的数目上以及各国支部的内部力量上来看，都超过旧的国际。

在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达到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的世界获得了一个与马克思所认识的和预见的不同的面貌。在评价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安全的问题上，一切资产阶级都有一种精神反应。他们不敢希望战争，并且也越来越不相信能维持永久和平。在俾斯麦的反社会民主党特别法失败以后，他们丧失了能够用暴力手段抑制社会民主党的信心，在日益

成長的工人运动面前他們看到自己不得不采取守势。在德国，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对政府日益示弱，而政府不断企圖用对工人在立法上讓步的方法使他們背叛社会民主党，但是沒有成功。讓步的主要部分，即那个由俾斯麦創始的劳动保險，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社会保險在物質方面給予工人的太少了，不能使他們滿足，但是在它的社会結果上却超过俾斯麦所希望的。它在保險机构（疾病互助会以及意外事件保險和殘廢保險諮詢委员会）里培养出一批工人階級的官員，他們向工人階級提供了充分的專門人材，这些專門人材以后将用于其他性質的組織和代表机构方面。劳資仲裁法庭通过工人陪審員的設施也起了这样的作用。依靠这些組織，于19世紀最后几十年以及在20世紀期間德国工人的工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扩展，终于在會員数目上几乎赶上英国的工会，而在內部組織完备和有效地匯集力量方面还要超过英国。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和新聞业与工会平行發展，工人階級在国会和地方議會中代表的人数也有了增加。一个合法的和自由的工人代表机关網遍布全国，不論重要性大小的城市都有一所由工人运动本身創設和維持的民众館或工会建筑物作为集合地点和工人書記处，在那里工人可以詢問和他們有关的各种社会法律，同时也通过这些事物的性質，使工人注意本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組織。此外，在这个新的世紀里工人消費合作社有了重大的發展和加强，它們的領導者和職員大大扩充了工人階級官員的队伍。

但是，在另一方面企业家也并不是沒有組織的。在純粹的經濟範圍內創辦了卡特尔和辛迪加，以便使竞争对物价的压迫不至于漫无止境；在許多情況下也可以在正發生或将要發生生产过剩的时候起調节生产的作用，这就是說，将生产暂时

有系統地加以限制。資本主義企業的另一更緊密的聯合形式是托辣斯式的聯合和大工業的合併或組成康采恩。為了與工會和其他工人聯合組織相對抗，又創設了企業家或僱主協會，協會的數目最後發展到這樣大，以致它們代表的企業所僱用的工人比在工會組織內的工人多得多。不管這些組織的數目和財力如何，它們抵抗工人的力量還是有限的。它們認為，和有組織的工人簽訂工資合同比它們片面地為工人決定工資數目的辦法來得聰明，這種情形越來越常見，在工會的統計中，工資運動以及其他運動不借助於罷工或同盟歇業而促使簽訂工資合同的情形大大地多於在企業中進行鬥爭來較量力量的情形。

所以，在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工業的社會面貌在若干方面基本上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示的不同。在“資本論”的“資本主義積累的历史趨勢”一篇中他是這樣說的：

“把這個轉變過程（企業的集中——伯恩施坦）的一切利益加以掠奪和壟斷的資本貴族的人數不斷減少，同時貧困、壓迫、退化和剝削的數量却在增加，但是人數不斷膨脹的、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本身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長。”

雖然經濟企業集中的運動很強大，實際上資本貴族的數目還是不斷增加。因而在普魯士（直到現在還沒有這一類的國家統計）從1895年（創辦財產統計的那一年）起到1914年財產超過50萬馬克的納稅者的數目，增加了50%多，而收入最多的階層的人數增加得更多。但是有中等收入的階層的人數也比全體居民人數增加得多，如果說工人階級所處的狀況還有許多應當改善的地方，但是他們在經濟上 and 社會法律方面的狀況比馬克思寫“資本論”中的那幾行的時候要好得多了。廣

大工人已經獲得9小時工作制，少數工人的工作時間多於10小時。工人的工資收入照額面價值增加得相當多，照購買力來說增加得比較少些，但是仍然大大超過了過去的水平。保護職工條例、勞資仲裁法庭、工資合同或工資合同執行局，保險條例、公眾和自由職工會設立的職業介紹所以及類似的設施與工人結社權相結合，就使得工人在企業家及其官員的面前法律地位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了提高。在工人世界的一定階層里還存在着貧困，但是它並沒有增加。麵包的谷類和烟酒等的消費量的增加以及按人口計算紡織品的消費量的增加等等情況就是這一點的標志；此外，死亡人數的減少以及結婚人數的大量增加也證明了這一點。隨着結婚人數的增加，出生的人數當然就會繼續不斷地增加<sup>①</sup>。因此像人口學專家所說的，這也是群眾貧困減少的一個標志。在先進的資本主義時代結婚數字的增加反駁了那些同樣由社會主義者根據上升的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現象所作的結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會引起無產階級家庭的完全離散。

當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不是自動地起了這些作用。它也不是完全沒有在這方面起作用，在各種不同的關係上它創造了社會改良的經濟前提。但是從上面列舉的事實可以看出，改良本身大部分是社會採取對策的成果，一方面是工人越來越強烈地通過政治壓力來加以影響的立法和行政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工人的經濟組織直接行動的成果。但是，無論那些造成另外一種景象的力量是什麼，在階級組成和階級的社會狀況方面決不象馬克思所描繪的。如果為了不致於錯誤地理解馬克思，必須說明，他僅僅標志出一種趨勢這一點

---

① 原文这里是減少 (Abnahme)，可能是印刷錯誤。——譯者



已經包含着現實可以引起一種與此不同的發展，那末這種不同的發展恰恰成了事實，並且因此已經預示出，今后的發展也不會按照那種式樣。

此外，階級的發展在农村與在工商業和交通部門中不同，它完全朝着另一方向進行。在這裡中小企業被大企業吞併的情形使人完全感覺不到。相反地，和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顯示出更大的堅韌性。這一些也是由於高度地利用社會對策而形成的，在這些對策中首先要提到組織極為完備的農業合作事業，充分利用它就可使中小農差不多可以得到以大量資本裝備起來的大地主所掌握的一切技術上的優點。但是還有其他在生產本身存在着的因素，這些因素使得在農業中的經營規模的發展和在工業中不同。現在只談其中最重要的情況，農業生產是一個基本上有組織地從事牲畜和植物培育的生產，而不是一個機械地為無生命的材料加工的生產。

戰爭在這一社會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沒有把任何東西加以改變。它引起了不同的階級和性別在職業上的暫時混亂現象。婦女必須代替在戰場上和後方以及作為佔領區的衛戍部隊的幾百萬男子填充工商業和交通等部門的空額；婦女的職業活動有了重大的擴展。工業被迫使它的生產適合戰爭的需要。為了製造大炮、軍火或炸藥擴大了原有的工廠，添建了新工廠，並且將以前製造性質完全不同的工業品的工廠改建為生產這些軍用品的工廠。此外，運輸綫的切斷造成了必要的消費限制，因此必須把糧食和其他重要日用品的貿易置於公眾監督之下，為了這一目的而設立了各種日用必需品的總管理處來調節上述物品對於消費者的交付工作。這種交付必須按不同情況憑需要証來進行，日用必需品，如麵包、肉類、牛奶等等實行配給制，商人只許憑配給証出售；對於上述商品也規



定出最高价格，商人不得向买主索取过高的价格。为了集中制造一定种类的工业品，在官厅的促进下創設了許多战时公司，这样可以节约生产中不必要的开支。

最后所描写的一切在当时被許多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来贊揚，并且从群众利益和最高經濟性的历史观点来看，它也确实与調整生产和經營的社会主义原則有共同之处。但是这样把資財集中起来并使生产和貿易从属于大整体的当前利益的做法在战争时期是常有的，如果要称它为社会主义的話，那末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和战争一样古老了。人們把它命名为战时社会主义，这在一点上不是沒有理由的，就是說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比战争的时间更長。它在过去沒有这样过，并且这一次在德国也不是这种情形。而且在这里恰巧是最需要維持的东西廢除得最快，那就是保护消费者不受重利盘剝。不錯，这个保护法在战争末期就已經遭受严重地損害。規定許多商品的最高价格每次都成了一种信号，就是这些商品在櫥窗里見不到了，而只能在背后（在“黑市”上）用重利盘剝的价格才能买到。在初期，瘋狂的爱国主义热情还注意到使多数人自願遵守为群众利益所需要的各种規定。但是当这种爱国主义热情冷淡下来的时候，重利盘剝和对这种行为的支持逐渐由于一部分人漫不經心和另一部分人沒有原則性而占了上風，以至最后誰不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买主还能忍受的价格，誰不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养活自己，都要被当作傻子。当帝国随着它的军队的崩潰也崩潰了的时候，社会道德也严重地动搖了。

革命只能暂时阻止根深蒂固的灾害进一步蔓延。还在革命的当然敌人，不同程度的反动者惊魂未定的时候，由俄国布尔什維主义的政府大規模地用金錢和其它宣傳手段装备起来

的煽动者已竭尽全力来宣传苏维埃专政，以破坏年青的共和国在人民中间的威信。提到作为战斗者参加过1919年在德国各地掀起的起义的多数人时可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要稍稍知道德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构成的人，都可以说，使德国服从一种苏维埃专政的号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促使农业占极大比重的俄国毁灭的东西在德国这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更不能忍受。有高度教养的机体在感觉对于它的机能的生活的暴力干涉方面比发展低下的机体敏锐得多。总之，作为社会主义者应该惋惜，人民代表委员会是政府形式的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并没有被更有效地利用，按事情本身来说这个政府同样是专政的政府，即使为尊敬它起见，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完全人道主义的、胸襟宽广的专政。例如，人们本来可以毫不遭受资产阶级抗议地，并且不使国民经济受到损害地借助于法令给国家规定比现在实际得到的多得多的对土地和矿藏的要索权，这些资产阶级非常高兴，因为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使这件事情危及它们的生存。但是，保护共和国不受左面来的暴力袭击成为迫切需要的。共和国肩负着由于关心到安插和遣散潮涌回国的几百万大军和东部及东北部不安定的问题，关心到战胜国的停战要求和许多内部的行政问题而产生的许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时，既然在总共和国的和成为共和国的各邦的权利的划分方面还存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并且还等着立宪国民会议来调整，共和国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以内讨论和制定这样一个侵犯各种权利的命令更是不可能的。

此外，共和国正是在关于私有财产变为公共财产的问题上不能自由地作出决定。从战胜国对战败的德国的整个态度看来应该估计到，于一定情况下这些国家可能在和约中保留

沒收公共財產的權利，而實際上在凡爾賽和約中也這樣規定了。在談到財政問題那一節的第1條（第248條）中就規定那些在和約中所確定的協約國對德國的各項要求作為由“德國和德國各聯邦一切財產價值和收入來源擔保的第一債務”。

在召開1919年1月19日選舉的國民會議的同時，完全由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人民代表委員會的政府宣告結束。通過了臨時國家權力法以後，國民會議於1919年2月10日以379票中的277票選舉社會民主黨人弗里茨·艾伯特為德意志共和國總統，但是，第一任內閣是一個由7個社會民主黨黨員，3個中央黨黨員，3個民主黨黨員和一個親民主黨的無黨派的內閣大臣所組成的聯合內閣。從那時起在德國只有聯合政府，就是說政府是由社會民主黨的和資產階級的內閣大臣共同組成的，1920年6月到1921年7月那個時期是一個例外，那時的內閣純粹由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組成。在今後幾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會在國會獲得多數，這不是不可思議的，但也不是非常可能的。相反地，在1920年6月的德意志共和國第一屆國會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的票數比起資產階級的票數有了相對的減少。在選舉國民會議時社會主義者得到13,827,000票，資產階級得到16,574,000票，而現在的情形是社會主義者得到10,952,000票，資產階級得到15,065,000票。社會主義者所得的票數由將近45.5%降到42.1%。

德國最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稱為多數社會主義者的黨，是通過由成長起來的人民利用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選出來的人民代表而參加到政府當中來的，因此只要那種票數的比例存在，社會主義也只能靠立法實現用解釋或說明的方法得到資產階級政黨中的進步分子贊同的那一部分。

这不一定是少的。人們常常想像實現了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但是沒有人可以对这一事实表示怀疑,即社会主义不是通过一个大飞跃就可以达到,而只能是一連串措施的結果,这些措施的實現有的需要經過較長的时间有的需要經過較短的时间。科学社会主义的偉大創始者在各种不同的場合也承認了这一点。沒有一項措施将会也沒有一項可以允許和当时的社会經濟發展状况不相适应。如果措施是这样的話,那末它就要失敗,而要求這項措施或强迫实行這項措施的社会主义者要比資產階級政党遭受更大的損失。但是,那些和社会經濟發展状况相适应的措施,即使是严重地侵犯了財產的权利和势力範圍,仍然可以贏得非社会主义的各政党的一定的一翼。

因此,仔細地深入研究經濟和社会政策措施的可以預見的作用是有必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以及作为在1848年革命爆發以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綱領”——为工人取得政权而制定了各項社会主义措施,今天,这些措施只能在这个条件下来考虑。这些要求的一部分已經由資產階級的运动和議會实现了;另一部分以一种趋于尖銳化的政治革命的形势和早已不存在的簡單情况为前提,其他一部分隱藏着連它們的作者也沒有了解的,即使在那种簡單情况之下也不可能了解的問題。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要求:“通过拥有国家資本和独享壟断权的国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屬於这一类的。這項要求和我們时代的高度發展并广泛分布的信貸制度比較起来簡直是兒戏。1848年的要求:“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也是这样,而今天這項抵押品掌握在公家的或半公家的机关的手里,如儲蓄所和保險公司等等。“共产党宣言”中“廢除繼承权”的要求已被它的作者在1848年革命綱領中改为“限制繼



承权”，并且馬克思后来在反对巴枯宁分子的笔战中称它为聖西門主义者的妄想。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定的要求获得另一种面貌，因此，那个作为要求基础的思想必須以另外一种形式得到实际应用。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作中需要一种非常詳細的說明。它使得当时可以做到的进步要比过去所实现的显得小，但是，这些进步却比过去所实现的規模大得多。

自从通过战争所引起的政治变革在德国和多数其他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权利方面的要求以后，問題就在于，使經濟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得到更大的实际应用，能应用于我們今天用社会化这个綜合概念来表示的事业中。显然我們可用公有化这个德国字来代替这个概念，但是这两个字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公有化这个字几乎只使人想到，由私人企业或私人企业集团变为公共财产和为了公众經營的财产。但是，社会化这个概念的范围更广。它还可以应用于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的轉变。这对于当前的問題是相当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国有化还是企业或工业轉变为社会公共财产（撇开地方的企业部門不談）最常用的方式，至于这个国是叫作邦还是叫作国是无关紧要的。今天在德国对于国有化还有哪些經濟以外的顧慮，上面已經說明了；但是，也由于其他的原因，不仅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而且就連社会主义者也对于說社会化可以普遍实行这件事抱着迟疑的态度。人們顧慮，在工业中会产生官僚主义，而且他們也不願意国家官員的人数无限制地增加。

这些顧慮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在人們常对資本主义生产加以指摘的問題当中有一点是无可爭辯的，并且也为馬克思坦白承認的：它是技术經濟进步的和節約材料与劳动的有力因素。官僚主义的生产能不能有同样的成就是值得怀疑



的，这不只是因为官僚主义的生产中对于彻底改良技术的推动力不一样，而且也因为企业家失去了冒险的勇气。并不像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所想像的，以企业或工厂范围的大小来断定它们对于实现社会化是否已经成熟。马克思在他的被引证的主要著作的一章里说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但是这个点绝不是所有生产部门里都是一样的。目前，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在今天问题完全在于寻找经济企业可以有资格社会化的客观特征和社会化最适当的方式。在这方面有许多已经实现了。从实践中来的城市建筑顾问霍尔屯曾经有六年做过梯森康采恩的经理，随后又当了大德·文特工厂的领导人，他在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社会化与复兴”里根据实际经验指出，应当从社会化的统一历史观点出发把企业加以分类，他并且提到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化避免官僚化的痛苦。在他看来准备社会化的生产部门是否已达到一定阶段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准则，在这一阶段上领导机关基本上只不过是一个机械地习惯履行职责的机构，并且可以判断出有根本意义的革新是否已经不会发生。按照该文作者的意見另一特征存在于产品的性质中，即产品是否为了满足一个巨大的并且在广大范围内均衡地存在着的需要，或者是否有一个不随兴趣和时尚为转移的销路。这样，为原料初步加工的工业和制造半成品的工业看起来比制造成品的工业更适于社会化，无论怎么说，原料加工工业和制造半成品的工业比制造成品的工业有更高度的集中，它们已成为大企业。纺织工业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在那里纺纱厂比织布厂和针织厂更高度地集中化了。

因此，为科学地有系统地分阶段社会化的顺序创造条件

不是不可能的，这种順序把問題从不加批判的試驗範圍內取出，并且避免失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化的各阶段。逐步实现社会化在許多方面都証明是必要的并且也是非常可能的。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它的目的总括起来就是取得特殊的經濟活动和普通的社会活动的成就以及改变在經濟方面工作的人們的法律关系。它的目的首先是在最能节约实际价值和人力情况下来最大限度地生产物質财富；其次是在工作程序和調整劳动代价方面尽量广泛地实行合作的原理，并提高在經濟中的职员和工人的法律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的立法上和行政上的一切彻底的措施都属于社会化的范畴。專家們都同意这一点。由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委员会組織的社会化委员会在他們的第一次报告中着重說明：这个委员会

“……知道，生产資料的公有化只有在較長時間的机体建設中才能完成，……。”

并且在它証实了一切經濟改組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的重新繁荣及德国的經濟状况迫切要求恢复輸出工业和对外貿易以后，它又詳細地宣布了下面代表它的观点的意見，

“……对于这些經濟部門來說，现在应当仍旧保持目前的組織。同样，工业的开工要求維持和扩大流通信貸和信貸銀行的完整的作用……”

为了利于食品供应也“不主張侵犯到农村关系中迄今为止的财产关系和經營关系”。在那里应当“通过适合于农业的措施和合作社的支持来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强度”。

稀排的那些字指出了上面作为社会化特殊的經濟目的的标志。

在事件的一般过程中工作强度和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通过竞争的压力得到的，这种竞争是企业家互相爭夺市場或銷

路而造成的。用以达到竞争目的的方法归根結底不外是节约人的劳动，这些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論述爭夺剩余价值的几章中已經描写过了，因为爭夺市場是爭夺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發生这种結果。凡在壟断关系發展的地方（而这种壟断是到处都存在着的），凡在商品供应超过需求的地方，企业家要求劳动强度的冲动也就相应地減低了，并且在一定情况下会消失了。其結果是物价高涨和广大人民处于困境，以致提高生产率或生产强度的問題成为高度的社会利益的主题。这种标志在許多地方被人们当作战争的副作用。

在德国，对战胜国的债务負担也使得节约劳动成为社会的利益。現在，这里因为商品缺乏企业还能获利，但是，实际上在規模和设备方面落后于生产發展的平均水平。由于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和生产工厂的不必要的分散，它們的繼續存在从国民經济上說是浪費了劳动。为了反对这种情形，拟出了改組国民經济的建議，給这种改組命名为計劃經济，属于社会化的范畴。

計劃經济的思想涉及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战争时期鉴于战时經济的必要性、根据富有思想的大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和社会經济学家維夏特·封·穆倫多夫的建議和他們所拟定的計劃由官厅安排的。在卡特尔生产集团的大工业中，这些措施是在保留資本主义过剩經济的条件下按照美国托拉斯的先例来实行的。应当按照国家法律的規定成立一切生产部門的企业家协会，并在各地方和各專区有机地成立分会，在领导机构中有任命或选举的代理人来代表群众、企业家、工人和职员。这些领导机构应该对工业的組織、編制和管理發生尽可能有社会經济意义的广泛影响，它們的中央应该

从需要的迫切性和德国经济的一般状况的观点出发，使输出输入服从起调整作用的法律。它们应该有权淘汰经济中无益的中间环节，并对在生产组织和旨在尽量降低物价的工作方法方面的一切改良发生作用。它们应该用规定工资合同和补充法律的方法来创造使工作情况尽可能令人满意的工作条件。

不仅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关心者尖锐地反对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经济部长鲁道夫·威赛尔所拟定的成为一个包罗很广的体系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也遭到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对。对他的指摘首先是说他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并且甚至于尽可能地在实践中加强他们的力量。说他阻挠了通常使用的原料如煤铁等工业实行迫切需要的全部社会化，并很容易地培植了损害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的规定和干涉。

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在由各方面联合组成的领导机构中犯这种错误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便已证明有害的法律也不难加以改变。同样也看不出，在民主组成和把经常的群众监督订在计划之内的情况下企业家协会为什么和如何还能加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权力。就是这个作这种强调的指摘是否被認為正当，这完全要看协会的组成，那个作为计划基础的思想并不因指摘而被否定。这些同样也适用于那个说计划经济组织和生产的调整延迟了，甚至阻碍了煤铁的全部社会化的指摘。凡是我們沒有计划经济协会或类似机构的地方都证明了社会化要与之作斗争的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

德国必须有一些这种类型的东西。德国国民经济的世界经济条件以及加在它的身上的财政负担使得它不可能长期保



留瘋狂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是随着廢除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的强制設施而出現的。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德国貨幣的贬值維持了国家的輸出并对国家的生产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它和貨幣价值高的国家相反，几乎不知失业为何物。但是其他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施行附加稅和其他保护措施来抵制貨幣价值低的国家的竞争，并且这些措施越普遍化（例如在美国已經用立法行动来作为开端），由于貨幣价值低而产生的利益就越少，而在筹备足值的支付手段来購買德国自己不生产的原料和支付它的外國賠款方面造成困难的缺点却仍然存在。进而采取徹底的措施以使其国民經济更加經濟化就成为維持自己生存的信条，如果人們不願意使国民經济听任由竞争而引起的資本主义战争的偶然性和殘酷性的摆弄，那末就應該着手施行那些在計劃經济草案中所規定的，即使也許还不完全系統化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在还没有得到發展的意义被使用，但是它們却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因为無論如何它們意味着向着由社会来調整生产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和把工人提高到在經济組織中可以參加决定的地位。它們可以有这样的伸縮性，以致在倡議有保留价值，就是說在可以起創造作用的地区的經济中它們使个人倡議有广闊的活动余地和不妨碍适于全部社会化的生产部門的全部社会化，而相反地予以便利。

此外，国家、各邦和市鎮的已經大大增長的和正在不断增長的財政需要也迫使进行向公共經济这个方向走的改革。在社会主义範圍內人們感兴趣的是，只要公家管理的經济部門和營利目的相結合，便簡單地称为国家資本主义或市鎮資本主义。如果这种資本主义是事业唯一的目的或支配一切的目的，那末用这个名称也还合适。当在这些企业里公共利益



是主要的动机,并且当涉及在这些企业里面的工作人员时,社会要素就显现出来,而盈余则与此相反,只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节约才能获得,今天这种情形越来越多地发生,前面所说的名称也越来越失去根据。此后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变为公营的,这固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每次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这些应当而且也将会增加。

共和国的财政需要非常大,就是把各种旧的直接税与消费税和交通税相混合也很难长久满足这种需要。因为这种原因,并且因为实际价值如土地、工厂和商店等等的所有者由于货币贬值靠牺牲群众利益的办法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所以要求直接由国家掌握实际价值的呼声响亮起来,社会民主党特别坚决地主张这一要求。共和国应该用通过票据保证国家在每年的收入中有一定份额的方法,也成为这些实际价值的所有者。实行一种措施使国家在一定前提下可以通过存放这种票据在国家银行的办法来抵偿悬浮的债务或纸币的发行,以便大大提高货币价值,这种措施同时也使共和国在企业的财政状况方面有更详细的了解,这样就可以提高它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这就是各色各样的地主和资本家对这种要求大力地、可以说是绝望地反抗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要求特别值得争取实现的原因。因为它是必要的信条,人们可以公开地说,它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并且是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因为它在国民经济整个范围内可以发生对社会有利的作用,而合法的营业并不因此受到限制。

社会主义思想的使用范围当然并不限于在特殊意义上的经济问题以及与它们有关的所有权问题。它包括对提高物质福利,对获得最高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以及与这种文明相适应的法律形式有意义的全部问题。在这里也涉及革新的问

題，這些革新個別看來還不是社會主義，而通過革新所包含的精神以及這些革新和許多以同樣精神來制定的改革的聯繫就將成為社會主義。從各級學校教育開始，直到有廣大分支的社會政策、法律形成、社會衛生及文化政策等部門中，社會主義以實行改革為前提；資產階級的政府和資產階級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或僅在特殊情況下接觸到改革的問題。

現在只談談社會主義政策，1918年十一月革命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的德國除了把勞動保護工作作了其他有意義的擴大，還宣布了工商業界最長的工作日為八小時。如果我們稱這項改革是向社會主義邁進了一步，我們又可以引証馬克思的話。1920年2月4日公布的職工委員會法對這個名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十一月革命生動的气息還起作用的立法國會議上制定的法律給了工人和職員在企业中的權利，這些權利人們在馬克思著作時期認為是不可能得到的。這個法律當然還是不完備的，並且它對於國民經濟收入所起的作用還不能完全一目了然。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並且在實踐中也為由於受一定宣傳的影響在制定這個法律時曾經和它作過嚴重鬥爭的那部分工人所承認：它是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再沒有其他部分象這部分一樣為工人和職員开辟了從工廠附庸變為在社會法律意義上的股東或同伙的可能性。正是只有通過民主共和國的爭取它才能制定出來。這個共和國當然才不過是經濟上的社會解放的一個法律槓杆，還不是解放本身。但是在一個像德國工業這樣先進的國家中，在一個有發展的以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組織得很堅強的工人階級的國家中，這個槓杆只能向着社會主義方向起作用。它不是根據一點就能適用於一切的公式，它不能在社会生活的整個範圍內一下子實行，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改變的。

36年以前(1885年)在为尤莱斯·居斯特和保尔·拉法格所編的关于馬克思写的1880年創立的法国工人党最低綱領序言的說明所作的附录中,該文作者写道:

“人們應該去掉梦想一个完备的未來国家的習慣而要坚持这种認識,那就是直到为社会主义原則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門中都开辟了道路,需要一个長的發展时期。

有些人在脑子里时常憑空忽略了一定的过渡阶段,但是,实践更是經常使这些空想家的計划落空。

模糊的梦想是一切具体思想的死敌。但是后者对于工人階級正是必要的。沒有具体思想,就沒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沒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就沒有有計划地对目的的认识和有目的的行动,这些是工人階級的解放首先必需的。”

这些句子在比我当时想像的还要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合理的警告出現,并且还得到一些补充。我对社会經濟的认识还差得很多。由于在經濟生活中估計过高的現象,我認为西欧和中欧能够比实际發生的更接近社会主义的实现,而且估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比实际所采取的簡單得多。經驗教育了我們,这个距离是相当大的,道路也絕不是簡單的,根本不能簡單地說是一条。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因此就灰心丧气。請允許我这样說:如果我回顧一下当时的情形,并且把它和今天作一个比較,我才看出,在和人生比較起来还是很短的時間內已經發生了如何强大的进步。道路不是当时所表現的那樣簡單,但是为了战胜它而工作的力量是在更完全不同的程度上大于当时。

一支来自各方面的比当年大20多倍的各种工人大軍以完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从事实現社会主义的工作。每个个人为

整体所做的工作和要完成的事业比起来显得很渺小，并且今天的进步和过去的进步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当我们从一个能够统观全局的相当距离来衡量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清所实现的进步。但是，关于大飞跃的梦想使我们并没有损失任何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年青弱小的运动可能需要这种梦想，为的是在尚未感觉到社会成就的遥远路途上不致失去勇气。壮大的、已经成熟的、能起创造作用的运动不需要它。相反地它只能损害这种运动。因为它们来说，错误的衡量将成为更大的不幸。常被误用的某个诗人的诗句对这种运动来说有充分的根据：

不受束缚的群英

枉自追求纯粹高度的完成；

谁想得到大的，就要倾注他的全力。

已经壮大起来的运动习惯于从它们的目的中暂时只考虑在發展现阶段上对直接斗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对愿望的节制却包含着得到所希望的最可靠的保证。

（摘译自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